

對高等教育，進行教育理論方針的重建，如「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生產力服務」等新教育方針的提出。其目的在於結束文革時期的政治掛帥，並以政治方式將社會導入。(2) 改革開放的階段，所以，自 1983 年至今的改革發展期被界定為下一時期。

此一段落的要點依然指向政治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宰制力，其中不同政治情勢下的政策轉變，直接的反射出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處於這種不確定的情境下，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實難有整體性正面的發展，當中包含著校際間品質的歧異性，其所引發的問題實值得加以深思。下文將依據上述這些研究，進一步探索相關的叢生問題。

### 第三節 啟示性

儘管以上三個研究對高等教育發展提出不同的劃分期，但是，其中的內容共同顯示出幾項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缺失：

1. **政治主導一切**：由上述可見，這些時期的劃分方式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消長，及政策變化有直接的關聯。在每一個時期中，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或是萎縮，皆起因於政治勢力的消長。這種情形反應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深受政治的牽引，此種特性固然亦存於一般民主體制的國家（姜添輝，民 86a）。然而，政治與教育的互動性往往參雜著經濟的因素，即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被設計來滿足經濟的需求，若無法達成，經濟勢力會迫使政治對教育加以干涉。但是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與政治間的關係，卻不是呈現這種特性，而是政治勢力直接的主宰高等教育的發展。其中主要的緣由，

是因為中國大陸當局無論在政治或是政策上，進行的路線絕大部份是中國共產黨所決定的，而這種情形又與其奉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密切的關聯性。此種特性的啟示是，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對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的影響性，這些方面將分別在第三章與第七章中作詳細的分析討論。

2. **教育政策搖擺不定**：在中國大陸政治勢力的消長中清楚的顯示出，領導者的主觀信念主宰整個社會的運作。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都是如此，即使現在與未來的後鄧時期恐怕都很難擺脫這種特性。其中主要徵結在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單元社會，黨的決策是最高的基本準則，而在這種決策過程中並未有真正民主的程序。相反的，決策往往是反應領導者主觀的一條鞭信念。當教育政策奉行每一時期強人的意念時，高教的發展常易呈現搖擺不定的現象。從高校數的發展情形便可印證此種論點，表一中的資料顯示出中國大陸的高校數並未有正常的發展，如從 1957 到 1960 年的短短三年中，高校數暴增超過五倍半 (562.9%)，隔五年之後卻又只剩約三分之一 (33.7%)。這種暴起暴落的情形，主要是受到當時大躍進政策的推動及後果所影響，這也顯示出政治情勢與決策的改變對高教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由此種關聯性來推測，顯然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也無法避免此種影響，關於這方面將在第六章與第七章中有詳盡的論述與說明。

表一 1949 - 1985 年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數的發展狀況

年份	1949	1952	1957	1960	1965	1976	1980	1985
學校數	205	201	229	1289	434	392	675	1016

資料來源：轉引自何大任 (民 83) 論鄧小平教育觀與中共高等教育改革。頁 19。

表二 劉水深等 (民 85) 研究的二十三所樣本學校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天津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同濟大學	浙江大學	華中理工學院	華南理工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工業大學	大連理工大學	復旦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	廈門大學	湖南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對外經貿大學	南開大學	東北財經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南京大學	武漢大學	暨南大學	

3. 學校品質不一：這種高校數量的大起大落，意謂著學校品質良莠不齊。就如前面所論述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大陸極度的嚴重傷害，每下愈況的經濟蕭條景象自然不在話下。這種情形更連帶拖累其財政收入，所以高教也存著經費不足的現象。即使在 1978 年開始執行經貿開放改革政策後，許多年的經濟成長率皆是二位數字 (見表三)，此種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仍未解決。在劉水深等 (民 85) 的研究便有類似的發現。表二的二十三所高校為其研究對象，其中有十所是重點學校，其餘亦皆是在中國大陸的名校。若是這些學校仍有經費嚴重短缺的情形，其他學校的情況將更為嚴重。劉水深等進一步指出經費嚴重不足減低教學成效，如無法真正落實學生的實習。再者，也造成低品質的學校設備，如許多學校的設備因陋就簡。關於經費不足所形成的問題是，是否高等技職教育也面臨此類困境？再者這方面問題的影響性為何？特別在設備與圖書方面，因為這些項目直接影響到學校品質，這些問題將在第八章中作探討。

4. 師資問題：在前文中已陳述到，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的斷層，如許多的高級知識份子被清算鬥爭，在此段十年的期間中研究生減少十萬人，大專學生更高達百萬人以上。這種人才斷層的問題至今仍存在。如劉水深等 (民 85) 便發現許多上表中的學校，存有適任教師不足的情形。許多管理教育的師資並非來自本業，而從

其他專業轉入，其中有以經濟與工科為主。再者，各校教師的學歷水準也嚴重偏低，如在哈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東北財經、大連理工、南開大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分別只有四、三、五、七位。這種師資問題更隨著薪資偏低，與市場經濟發達後急需人才的情況，而更形惡化，有許多教師放棄教職轉而投效私人機構。在清華大學擔任商科的教師，如財務會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市場營銷等，流失比率高達50%。這種師資問題所暗含的意義是，高等技職教育是否亦有此類問題？再者，這種問題對教學的影響性為何？特別是在教學成效與課程安排上，因為這些項目與教師的教學有緊密的關聯。關於這些問題在第八章與第十章中皆有相關的分析與探討。

總結這些問題的徵結所在，似乎直接與間接地指向中國大陸獨特的政治型態。就如前文所顯示的，高等教育主要在於配合經濟的政策，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又深受其政治勢力與型態的影響。此種關聯性明顯顯露出高等教育、政治與經濟間有著緊密的交互作用。此種特性對研究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的啟示性是，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經濟政策，因為高等技職教育隸屬於高等教育的一部份，自然無法免除政治勢力的影響。再者，高等技職教育具有明顯的職業導向，其目標在於滿足經濟生產活動所需求的高素質勞動力（請見第七章與第九章），所以高等技職教育與經濟發展政策間必然有著相互緊扣的關聯性。關於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的政策、特性與影響，將在隨後的第三章、第四章與第五章中作詳細的分析。